

似，其族群特點使他們成為理想的中間商。他們通過個人、語言、宗教和社群紐帶結成的網絡進行壟斷，這些紐帶不僅把他們聯繫在一起，而且也把他們與清帝國城市中的競爭對手區別開來。

本書也對關於文明的一套說辭進行了反思，即皇帝和國家都是文明的贏得者，他們的作為是為了保護文明，包括開疆拓土；當文明深深扎根在語言、禮儀、社會結構和當地居民的心裡的時候，文明才有了保障，等等。顯然，在作者看來，這套說辭是帝國為了成為認同中心而創造的。本書希望盡可能準確地給出這套說辭的歷史情境：比如，即使在16世紀，在明文明與異文化之間的文化、道德、政治特權的差異方面，並不是只有一種書寫方式。柯嬌燕的文章裡提到的蕭大亨曾對此多樣性有所涉及，蘇棠棣的文章裡提到的田汝成，也對苗人和其他西南族群進行了迥然不同的描述。

在本書中，歐立德試圖表明滿洲人定位其「族群性」的複雜性，科大衛則探討了15世紀廣東的定居農民與「瑤人」的身份差異，而這與是否被編入戶籍、承擔徭役有關，因此成為「民」比具有族群性更重要。這些似乎說明明代的瑤和清代的旗人都在經歷一個成為「民人」的過程，既存在選擇特殊身份認同、也存在選擇默認為民的認同的可能性。

本書顯然有一個人類學的概念起點，對於這些歷史學家來說，這些概念在其討論中的作用顯然是不同的。在我看來，這些概念只是我們得以用不同時期和地點的個案來討論問題的共同平臺，而不是指導我們理解歷史的理論基礎。這些概念及其相關的討論引發歷史學家去注意以往未曾注意過的歷史，注意那些以往未曾注意過的史料，也可能會對這些史料產生不同以往的解讀，但他們並不是研究的終點，就歷史研究而言，他們是形成依據史料而得來的新的概念的臺階。

【附言：對本書的更為詳細的討論可參見拙文，〈在歷史中發現族群，於草野間審視朝廷〉，《神州交流》（澳門），第3卷，第3期（2006年），頁70-87。】

趙世瑜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

王明珂，《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根基歷史的文本與情境》，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349頁。

早在1920年代，有心「創新史學」的梁啟超歸納「現代中國人所需要的

中國史」研究項目，就開宗明義論述到「中華民族」活動地域的推延、「我文化者」與「外來蠻族」的互動接觸、政治組織「分治合治交迭推移之跡」等研究要點，旗幟鮮明地強調國史研究的中心即在於說明「中華民族」如何形成的宏觀歷史過程。【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頁5。】近一個世紀以來，許多學者的學術興趣，常常集中在這些引人入勝的問題上，他們嘗試解釋中國如何整合和締造出來各種運行機制，見解異同，各成學說。藉由學科知識的積累，一般可認為，在中國這樣一個有悠久文化傳統和王朝統轄體制的國度中，地方社會的變化歷程，既源自國家制度及其對不同地域進行統治的策略變化的過程和結果，也源自地方上富有能動性的人們如何運用各種文化權力資源，有意識地創造和表達他們置身其中的生活世界——這個世界是有限資源的地域環境、組織架構和關係網絡，也是特定地域文化傳統編織而成的心理感知。總之，無論研究之切入點是市場體系、宗族組織、官紳關係，還是信仰儀式變遷，重要的可能不單是從「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視角轉換，以大量地方性資料重構史實細節，而是一旦面對具有時間與空間距離的意義世界，我們如何能夠跨越時空阻隔，在心智上真正置身「歷史現場」，體察紛繁的事態表象所隱含的歷史過程與觀念形態，即如柯林武德（R. G. Collingwood）所言，要超越「事件的外部」，識別其中「由思想的過程所構成的內在方面」。【柯林武德，《歷史的觀念》（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頁300-302。】由此而論，我們或許有理由將本書作者王明珂先生的「邊緣研究」，置於更廣闊的學術脈絡中考量，而不單局限於該項研究對民族史的意義及影響，在他一再標識的「文本分析」中，研究的要義就不在辨別真偽，而更在於了解特定時空情境中個人的動機、意圖和情感。

王明珂長期致力於從資源競爭、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之間的交互關係，建構有關中國民族起源和形成的新詮釋。在頗受矚目的《華夏邊緣》（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及《羌在漢藏之間》（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二書中，作者已充份結合考古材料、歷史文獻和口述資料，描述了自新石器時代以來，在生態變遷和資源競爭環境下「華夏」認同的萌生和演變歷程，並以川西羌族的豐富田野資料，闡述了三個不同層次的族群認同體系如何在一個「邊緣」地區逐步形成的長期過程。現在擺在讀者面前的這一新作，據他所言，既是「長期從事之『華夏邊緣』研究的一部份」，也是前兩書論述的「延續與進一步拓展」。（頁21-22）

毫無疑問，本書的基調，諸如生態資源競爭對族群關係的影響、《史

記》等典章文獻的歷史記憶內涵、共同的祖源記憶對凝聚及脫離一個族群的意義等等，已在前著中得到深淺不一的表達。不過這一新作，重在梳理各種中國文獻中廣泛存在的「英雄祖先歷史」及曾流行於中國和周邊地區的「弟兄祖先故事」之間的關係。通過發掘這些為人熟知的華夏起源故事及其模式化敘事情節的結構化的過程，作者仍旨在提出中國民族起源的新詮釋，即「更重要的『起源』發生在『華夏邊緣』人群間的一些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變化」。（頁13-14）

本書前言以「中國民族起源與形成」為題。在作者看來，近代以來的中國民族起源研究存在三種表述脈絡：清末至20世紀上半葉的研究主流，常以各民族集團的戰爭與融合說明中國民族的形成，中原之人（或漢族）是這一多元之起源歷史的核心；20世紀下半葉以考古學者為主的中國文明起源論述，傾向於「本土性」、「古老性」與「多元性」，不只是從「起源」，也從「過程」說明「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構成；與前兩者強調「一個延續性的歷史」相比，當今的學者則以後現代理論的視角視中華民族或少數民族及其歷史為一種近代建構。在不同於以上論說的框架中，作者希望由所謂「華夏」的形成及「華夏邊緣」變遷的歷史來說明歷史上「中國」的內涵變化。他指出，本書將以「歷史心性」、「文類」和「模式化敘事情節」這三種歷史「敘事結構」進行分析。這三者互為表裡的關係在何種情境下出現，又如何產生作為華夏歷史記憶的文本，以及這些文本又如何強化華夏認同意識，構成本書論述中國民族起源和形成的主軸。

全書除了第一章由川西岷江上游村寨流行的「弟兄祖先故事」為例拋磚引玉地導出對我們熟知的「英雄祖先歷史」的反思，以及結語之外，循着作者表述華夏認同及邊緣變遷形成的時間歷程，以下章節大致可分四部份。

首先，是春秋戰國華夏認同意識的萌生階段（第二章）。作者延續前著《華夏邊緣》的論點，指出新石器時代晚期以來黃土高原邊緣以氣候變遷為主的生態變化，引發農業定居人群和游牧人群的資源爭奪，「英雄祖先歷史心性」開始出現在崛起於這一過程中的商周上層社會。到了西周中晚期至戰國時，在北方「戎狄」威脅的特殊背景下，雖存在過炎、黃為兄弟這樣的祖先歷史敘事，但隨着政治統一的推進，以「黃帝」為起源的「英雄祖先歷史」最終成為整合各部族祖先歷史的主流，華夏認同趨於明確化。

其次，漢晉時期藉由正史、方志文類的書寫和模仿，華夏認同得以確立（第三至四章）。作者以《史記》和《華陽國志》為分析對象，探討正史與方志對以「黃帝」為華夏共祖的「英雄祖先歷史」如何變成典範歷史的意

義。他認為，前者因應帝國統一的情境，有關「黃帝」的書寫表達了「漢帝國之血緣、空間、時間和權力之核心與邊緣」（頁75）；《史記》這一敘事模式被不斷模仿，成為正史典範，其「英雄祖先」主題又經由後者（方志）的出現向邊緣傳播。《華陽國志》及相關蜀人的祖源故事表明，漢代以後華夏歷史書寫者將「蜀」納入一個以「黃帝」為起點的綫性歷史中，而以常璩為代表的蜀人又透過方志的書寫，攀附中原華夏，宣稱「巴蜀為華夏之域，域中之人為華夏之人」（頁101）。

復次，是漢晉以後至明清華夏認同的成長、擴張階段（第五至九章）。作者首先指出，漢晉時正史中存在四個「英雄徙邊記」敘事，分別是箕子王朝鮮、太伯奔吳、莊喬王滇、無弋爰劍奔西羌。與兩種根基歷史敘事規範（英雄祖先歷史心性與相關文類）一樣，這些「英雄徙邊記」敘事同是中國文獻常見的根基歷史敘事規範，可視為「模式化敘事情節」（頁111）。雖然他們被華夏歷史書寫者用以詮釋華夏四方邊裔人群，也隨着正史、方志文類書寫而傳播，但是漢晉以後至明清，四方邊裔人群在回應這一被賦予的英雄徙邊歷史和處理本地起源故事之間的關係上，卻表現出微妙差別。其中突出的例子，是12、13世紀以來朝鮮知識菁英逐漸擺脫外來祖先「箕子」，選擇「檀君」為共祖，最終建構出自身的朝鮮認同。相對於朝鮮，更多的情形是類似「英雄徙邊記」這樣的歷史記憶隨着帝國政治地理邊緣的擴張，逐漸出現在南北疆邊緣人群的歷史敘事中，更隨着家族譜牒深入社會中下層，造成「明清各家族之『宗族源流』很難不與黃帝、炎帝發生關係」的局面。（頁251）

由帝制過渡到民主共和，作者最後論述了華夏邊緣的近代延續和變遷（第十章），重在說明，早期的民族史書寫仍以「黃帝」為起始凝聚一個共祖的華夏認同，更嘗試運用各種「新知識」，在明確的「國族邊界」取代模糊的「帝國邊疆」情勢下，描述出近代中國的邊疆和人群，實現了新文類「民族史」下的「華夏邊緣再造」。（頁270-274）

勾勒了一幅宏觀的華夏歷史發展圖景之後，作者以岷江上游瓦寺土司的三種祖源故事為例（第十一章），進一步總結了前述「歷史心性」、「文類」、「模式化情節」如何在一個近代中國邊緣的微觀例子中展現出來。

作為理論探討的結語部份，作者集中闡述了對「邊緣研究」的理解。在他看來，任何一個個人或事件、或與之有關的敘事，都是社會情境與歷史過程的產物，也都可視為「文本」；文本與情境存在「互映、互生關係」（頁311），置身「邊緣」深入分析文本與表徵、符號與隱喻，探索其相應情境與

歷史背景而獲得「新知」，可資反思我們自身熟知的文化與知識體系。

概言之，與前著結合起來，細心的讀者完全可能體會到作者重構中國民族起源和形成的努力。我尤其敬佩作者以此研究獲得「歷史新知」，旨在促進「『炎黃子孫』及其『弟兄民族』間和諧與凝聚」（頁5）的現實關懷。

不過，正如筆者開篇指出的，不應僅在民族史層面看待這項研究。和以歷史記憶為分析工具的諸多研究一樣，作者有關華夏認同形成過程的描述，也有意無意地忽略了記憶播遷機制的若干重要環節——尤其在地域歷史、傳播媒介與受眾之間的關係上缺乏具體時空脈絡的細緻討論。在文本書寫者筆下的典範祖先歷史與不同地域歷史文化背景下民眾意識中結構化的祖先故事之間，並非不證自明的因應關係。譬如川湘黔人們常宣稱祖上來自「江西」、「南京」或「湖廣」，作者認為這些「代表華夏地緣符記的特定『郡邑』，也是援借攀引的對象」（頁238）。但若對明清以來官府軍政勢力（衛所、屯政等）、地區開發及土客關係的本地「情境」缺乏充份認識，我們又將怎樣理解何以偏偏是這些「特定『郡邑』」成為攀引對象呢！

又如，社會文化史研究日益表明，唐宋尤其明以後是廣闊的華南、西南地區經歷地區開發與國家秩序建立的關鍵社會轉型時期，文字教化、禮儀變遷和王朝制度在鄉村的演變，深刻改變地方民眾有關國家的觀念和文化傳統的建構，如此重要的「邊緣」時刻和「情境」未能在作者的研究中深入討論，同樣讓人不無遺憾。

在反思傳統民族史研究模式的學術道路上，王明珂先生的舊著新作都顯示了非凡的魄力和見識。若讀者尚有意猶未盡之處，那麼借此作品，重新思考祖先故事、制度禮儀和國家建構之間的深層關係，更注重具體歷史過程的分析，對理解中國民族起源和形成，或不無意義。

陳賢波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

***Time, Temporality, and Imperial Transition: East Asia from Ming to Qing.* Edited by LYNN A. STRUVE. Honolulu: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nd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 x, 300pp.**

《世界時間與東亞時間中的明清變遷：從明到清時間的重塑》是一部由六篇論文構成的論文集。這些論文來自於1999年6月在印地安那大學布魯明頓校區召開的「世界史與中國史時段中的清代形成」會議。這些論文所關注